听那强弓响箭(荆楚文坛作家文库第三辑)

吴平安著

湖北长江传媒数字出版有限公司

一次文学与人生的“突围”

——读丁朗长篇小说《突围》

有人说:一个作家准备写一部新书,如同面临一场危机。

面对着丁朗先生的长篇小说《突围》(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2009年10月),此话在心头倏然掠过。我想,倘若命运之神能够垂顾当年的热血青年,让其在文革前“17年”,或者在“新时期”之初撰成此书,摆在我们面前的《突围》,该是一种何样的文本呈现方式?俱往矣,当丁朗先生以七旬高龄撰写这部长篇时,时代语境已经出现翻天覆地的变换,他固然可以接受改革开放这30年思想的、艺术的丰富馈赠,而这笔财富却又反过来构成了他必须超越的高度,或者说必须突破的壁垒,言其“面临一场危机”,当非虚言。换言之,只有在文学与人生两个向度实现成功的“突围”,方可衡估他是否为尚嫌单薄的中国军事文学,提供了一点新的元素。

一

事实上,“危机”自题材确立之日起便已不可避免。

丁朗选择的题材是“中原突围”,这是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之初,一场充满血雨腥风的悲壮的战役。这一选择的“危机”首先在于:先行者业已扫荡了革命历史中的边边角角,此类题材在小说与影视中已多有

表现,《突围》已经无法抢占题材的先机了;这一选择的“危机”还在于:将小说的整体构思依附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某一战役,曾是17年战争小说的惯常模式,例如《保卫延安》以青化砭伏击战、蟠龙镇攻坚战等等贯穿首尾,《红日》以涟水、莱芜、孟良崮诸战贯穿首尾,皆成就了所谓的“红色经典小说”,成为悬于《突围》之前的标高。读者有理由对这种“战役结构模式”保持足够的警惕,它已经很难满足当前读者的阅读期待了。

“中原突围”是丁朗心头挥之不去的情结。他大半生都同参与突围的这支劲旅不弃不离,目之所见,耳之所闻,正史野史,皆关“突围”。换言之,在题材上,他别无选择。他只能在具体的操作上,力图与“红色经典小说”拉开距离。

将《突围》的布局粗略地做一番统计学的分析是必要的:近30万言的篇幅,涉及“突围”的部分不足三分之一,而正面描写突围战斗的篇幅则不足四分之一,这便与《保卫延安》、《红日》战役全景式的宏大叙事大异其趣了。换言之,在丁朗笔下,其关注点已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。他将大部篇幅,设定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,全面内战打响之前,位于两场战争之间大约半年光景的“不战不和”的时间段,遂给上至旅团首长,下至普通战士形象的展示,提供了舒展的空间。而这段特殊的“和平生活”,由于一群来自不同背景、怀抱不同动机投身革命队伍的城市知识青年(其中有多名女性)的加入,顿时显得风生水起色彩斑斓起来。

对全景式宏大叙事的另一偏离,是《突围》对“两军对阵”模式,以及通常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敌我泾渭分明的两大话语系统的舍弃。丁朗将目光聚焦到突围部队一方,而将其对立面,即围追堵截的敌方部队完全推到了幕后,几乎不着一字。如此处理,在战争小说,尤其是长篇小说中是罕见的。一个典型的例证是,甚至直到激战前夜,一幅关涉部队生死存亡的敌我战略态势图,以及突围方向的判断,居然出现

在曾任军区《抗敌报》记者的女兵冯苗智力游戏般的思维活动中，而不是通常那样理所当然地出现在敌方或我方将领的指挥部中。

在“不战不和”的这个时间段里，战争似乎遥远了，和平似乎降临了，军人也终于可以谈婚论嫁了。这既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氛围，又为军旅日常生活叙事腾出了大量笔墨，而后者正是丁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长项。于是，一幅战地的风俗、风情画卷，就在作者笔下徐徐铺展开来。小至于大灶中灶、号房分房、夏装冬衣的饮食起居，大至于紧急会议、人事升降、军民协调的战争机器运作，皆不紧不慢，娓娓道来。我们看到：一纸调令，竟也如同一石入水，平衡失衡，在领导层掀起层层波澜；突围方向，向东向西，事关该部生死存亡，而其决策依据，在惯常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态势之外，干部的情感情绪，即急于同留在华北的家属团圆的愿望，竟也占据了重大筹码。

在这幅战地风俗、风情画卷中，情爱乃至性爱的内容占据了不少篇幅。此虽一永恒题材，但其表现形态却是千姿百态的。团长高震与管娴“快刀斩乱麻”式的谈情说爱，以及紧随其后简直是创造奇迹式的结婚，这种唯有战地军人方有的婚恋形态，即便是今日的“闪婚”一族也望尘莫及；贺薇敏的婚姻选择，是一种放弃任何的罗曼蒂克、任何不切实际的东西，而代之以美国式的实用主义盘算；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，则是冯苗超越功利的荡气回肠、欲仙欲死的爱情……性爱的描写，在90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中已是司空见惯，但《突围》的性描写，却掀起了严酷战争年代人性隐秘的一角，为以往战争文学未曾涉足或有意遮蔽的一角。这显然不是或主要不是出于迎合市场的欲望化写作目的，也同性别意识、身体意识、私人空间的刻意展示形同而实异。不妨说，正是这些包括情爱与性爱的内容，使《突围》得以突破极易陷入其中的简单还原历史的陷阱，为战争年代各色军人心灵史的传达找到了依托。

二

战争小说中的人物塑造，与其他题材小说相比，是一个很不容易把握好分寸的问题。仅以正面人物论，“红色经典小说”中的英雄，通常是经过“过滤”和“净化”处理了的，其身上附着的过于强烈的神性，是进入新时期后经常遭人诟病的地方。作为反拨，30年来许多作家进行了有益的艺术探索。自《亮剑》令人耳目一新而广受欢迎以来，后继者逐渐形成了“传奇性+草莽性”的新套路，即在传统的英雄形象之外，再添加一些草莽习气，诸如抗命不尊，违反军纪，出口成“脏”等等，都是为了祛除神性还原人性的努力。

在谈及《突围》写作秉持的理念时，丁朗说他只坚持一点：写真实。这看似简单的三个字，却自有一股底气。作者显然自信：只要写出了生活的真实，人的真实，那便自然是真实的生活，真实的人；神性也罢，草莽性也罢，都不过是刻意为之的产物了。

写活一个人应该说不难，或者说不太难。但写出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人，却对作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文学画廊对新面孔的接纳历来是极为热情的。

在我看来，旅政委张子学堪称是一幅新面孔。

军人形象，自古以来多有三类，一是“与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”的勇猛型，二是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”的智能型，三是“羽扇纶巾，文武双全”的儒将型。张子学显然很难归于其中任何一种类型。即便是当代文学中我军的政工干部，也少有此鲜明而复杂的形象。

“张子学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个老练而不可多得的政治工作者。”这不可多得的“老练”，是他性格的主导方面。

如果说军事工作是一种“技术性”工作的话，政治工作则是同人打交道的工作，它需要的是另一种才能：“几十年从事政治工作的经历，使张子学磨练出了一个牢记别人名字、特点的能力，凡是他亲自谈过

话的人，见过一次面之后，基本上能做到过目不忘，甚至可以在多年分离之后重逢时脱口叫出对方的名字……使对方觉得，他对你某某某是重视的、亲密的，经常挂在嘴边因而才会有这样深刻的记忆的，从而使这人对他不能不产生一种强烈的好感乃至敬意。”

“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，政委头上早已笼罩了一个老大老大的光圈。他就是独立旅的马克思，他就是独立旅的毛主席，他的谆谆教导无不被人奉为经典，好像善男信女们朝山礼佛，绝对不会怀疑那高高在上的神灵不过是一堆泥胎而已。”

张子学的“老练”，还突出地表现在“是处理复杂问题的高手”上。面对周强副旅长盛怒的发作，他能以柔克刚，轻松化解之；面对旅长孙学义宿娼这一棘手问题，他善于领会上级“以不严肃的态度化解严肃问题”的“韬略”，而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，“装聋作哑”，“一笑置之”；对下级针对此事的反映，则“相机行事”，或硬或软，一一解决；当遭遇到“激进的只认死理的知识女性”冯苗“义正词严”的告发而遭遇危机时，他又不愧是一位心理分析的高手，能谙熟对方心理，步步为营，最终化险为夷。

更异于以往军人形象的是，张子学在接纳入伍的知识青年时，他的思考几乎溢出了政治委员的身份：

“选择我军就是选择痛苦，并且有可能就是选择死亡”；“整个中国的前途无疑是一派生机，但是，对于我们每个个别的人来说，也许更多的倒是死机呢。真正的选择还在未来，严重的时刻还在前面。这些人的命运如何，神仙也无法预料。”这里没有惯常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，有的是悲悯情怀和对命运的敬畏；这里没有惯常的对正义战争的讴歌，有的是对战争非人性、反人性一面的体认。作者的分寸把握得很到位，这些思想不过是偶尔一闪念罢了。倘若让其时时处处作此哲学沉思状，人物便有悖于历史真实，也不是按自身逻辑行事了。

三

作家写作的驱动力，亦即为什么写作，也是一个亘古常新、人言人殊的问题。探究这一问题，知人论世的方法没有过时。这个中学时代即追求进步，投身革命，继而放弃京城中央机关而请缨赴疆的热血青年，竟在建国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受尽折腾。“肃反运动”，“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”，“反右斗争”，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一路运动过来，风刀霜剑，艰难竭蹶，非个中之人，无以知个中滋味。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丁朗一面背负十字架，一面却代领导人挥毫写作，几十年不辍，竟蔚成大观。为人代笔，即古之所谓“捉刀”，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。一部《丁朗代笔作品选》(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，2009 年 8 月)，将给后人提供一个含义丰富的文化密码。明乎此，则可知丁朗以古稀之年，操持长篇，既非以往政治性的遵命写作，也非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审美写作，或者功利性的市场写作，更非“玩文学”的自娱自乐式写作，乃是心有郁结，不得其平则鸣，属于“圣贤发奋之所作为”之列，言其是一次生命的突围，实不为过。就写作的驱动力而言，丁朗回到了中国叙事的原点。

然而，在如今这个熙熙攘攘的文学江湖上，靠什么发出自己的声音呢？靠什么和后辈晚生较量呢？比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吗？那显然并非自己所长；比形式技巧叙述圈套吗？那同样并非自己所长，何况就此已很难有所作为，国外早有人发出“小说死了”的感叹了。

丁朗无须借助想象，他调动的是一生的生活积累、艺术积累。

你看停战以后，两军代表在阵地前沿接触的情景：“两人走到一起，相互敬礼，错了一下马头，以示亲热。”完成任务以后，“两人就马上探身握手，敬礼，又相互错了错马头，就各自转身打马沉着地走向各自阵地。”

情节可以虚构，细节很难杜撰，一个看似不经意的细节，考验的却

是作家生活储备的多寡。

“备战工作无秘密可言,政治部焚烧文件……原来空缺的岗位也都充实起来,提拔了不少干部。”寥寥数语,字字本色,而信息量之大,溢于言外。

正是全书细节密集的戎马生涯的日常生活叙事,使有军旅生活经验的人读来产生亲切感、温馨感,使无此类经验的人读来产生陌生感、新奇感。

丁朗也无须乞灵于形式技巧,他依靠的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智慧。他特意引述鲁迅语录:“革命是痛苦,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。”他不避将这些“污秽和血”展示出来,这使我们很自然想起司马迁撰写历史人物传记所遵循的实录原则:“不虚美,不隐恶”。丁朗对中国叙事学的皈依,正应和了所谓“后新时期”现实主义重现生机的当下语境。

如果说写作《突围》是丁朗的一次人生“突围”的话,那么在书中人冯苗身上,便是作者有所寄托的了,这与《屈原、贾生列传》之于太史公类似。在小说的人物群像中,冯苗是作者情有独钟,不惜以浓墨重彩书写的一个。作者与之惺惺相惜,甚至可以说,在她身上有作者身影的曲折投射。这个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,秀外慧中,通体阳光,却偏偏时乖命蹇, 一生坎坷。她背负重物在突围路上艰难跋涉的身影,成为一个极具象征性的意象。小说对其悲剧性命运抽丝剥笋般的解剖,凝结着作者对人性、人生、人的命运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沉甸甸的思索与叹喟。

冯苗的悲剧, 始于贺薇敏 “心中的嫉恨之火”,“开始时不过是竞美,无非是女人之间的斗心眼”,所谓“风流灵巧招人怨”罢了,本无任何“阶级斗争”的色彩,可是一旦和突围方向的“泄密”联系起来,性质便陡然严重起来;调查这一问题的保卫科人员带有时代共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,又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。作者特地插入一段“背景知识”:

“所谓保卫科，是大有其历史渊源的。红军时期叫‘特派员’。当时流行一句话，叫做：‘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特派员找谈话。’特派员一找，十个倒有八个活不成。抗战时期，改叫‘锄奸科’，后来为了添加一点温和色彩，叫成了保卫科。这是我军相当神秘的一个单位。人一旦当了保卫科长，心理和眼神会一起发生变化，总觉得敌特如毛，不抓他几个出来总不解气。”

丁朗以强烈的反讽口吻谈到保卫科长梅闻醍，在组织科当干事时，“把人人看做壮大我党事业的有生力量。自从管了保卫，便开始神经兮兮”，“用异样的目光看待别人”，“革命警惕性像火山喷发一般高涨”，“为不能早日一网打尽敌人潜入我军的间谍网而懊恼”了。在这种“有罪推定”的思维惯性下，一系列阴差阳错，巧合误会便都有了邻人偷斧的疑心，乃至于判断“极可能在独立旅还有她的一个奸细网”，一场“肃反扩大化”的风暴，其实已经在当事人心中酝酿了。

就主观方面来说，冯苗曾任军报记者，原本行走于高层，倘换种活法，如学学贺薇敏者流，则“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”也未可知，但心性高远不合世俗的她听从心灵召唤选择了另一个对象，从而也就选择了另一条人生道路。加之获悉了旅长宿妓丑闻，“‘察见渊鱼者不祥！’发现别人的隐秘是会面临灾祸的”，冯苗失去了高层遮风挡雨的保护伞，悲剧就是不可避免的了。

作者耐人寻味地指出：“冯苗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喜爱动脑筋”。“动脑筋”是人之别于动物的最大的优点啊，怎么就成了“最大的毛病”了呢？事实上，冯苗对上述“敌我战略态势图”的分析，以及建立其上的对突围方向“声东击西”的判断，果真成了她一生悲剧命运的直接导火索，用一位俄国作家的名言表述，这叫“聪明误”，或言“智慧的痛苦”。

我们或许该责怪冯苗，只知道为避免麻烦身体上自我丑化，却不知道精神上装愚守拙，韬光养晦。这正应和了一句古语：皎皎者易污，峣峣者易折；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

如果说上述事端极具时代特征、中国特色的话，促成冯苗悲剧的，还有许多偶然性、随机性的因素。上级领导在审查冯苗档案材料时，未见异常，遂随手打一问号，而“就是随便打上的这个问号，竟然决定了冯苗此后的半部人生。这是冯苗至死也无从知晓的，尽管她聪明过人。”而种种阴差阳错，巧合误会，也不能不说暗含玄机。极左的倾向固令人唏嘘扼腕，命运的吊诡更令人惊心动魄，直让人叹惋：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

还值得注意的是丁朗的叙述语调，那是一种风雨歇息之后从容淡定心态的呈现，但又绝不等同于所谓“零度情感”。恰好相反，作者对人民军队发自肺腑的爱，那种纠缠如毒蛇，执著如怨鬼的爱，虽历经坎坷而九死其犹未悔，端的是丈夫胸怀，战士气概。

（原载《神剑》2010 年第 4 期）

鼬鼠与老酒

——读周涛散文新著《我醉欲眠》

读周涛散文，常有震撼之感。

岁尾年头，作家出版社又推出了周涛一部散文新著《我醉欲眠》。米色封面，雕版印刷，朴素高雅，绝对是平面设计中一流精品。拜读之余，心头袭来的仍然是深深的震撼——只是此一震撼已非彼一震撼矣，坦言之，这是一种由陌生感引发的震撼。

这是周涛其文吗？这是周涛其人吗？

先匆匆浏览一下篇名：《鱼儿要上钩》、《猫与女人》、《有狗叔叔在》、《小狗为什么这么可爱呢》、《为何忘记童时模样》、《晒太阳，思往事》、《买花记》、《南国花木》……

脑际倏然闪过的，是耳熟能详的篇目：《哈拉沙尔随笔》、《吉姆萨尔记事》、《游牧长城》、《兀立荒原》、《天似穹庐》、《山河判断》……

再细看一下文本的直观呈现。小小说界倒见过所谓“百字小说”一体，可是至今谁听过“百字散文”一说呢？《我醉欲眠》中，竟有多篇 300 字，200 字，甚至 100 字的文章。即便是古人文言，已属罕见，何况操持白话者。

想当年，周涛散文横空出世，数万十数万字长文，偏离了冲撞了颠覆了既定的文体规范，令散文界为之震撼，呼之为“破体”现象，潜台词却是：这是散文吗？散文也能这样写吗？

而今，面对“百字散文”，这又一“破体”现象，心头生出的是同样的震撼，同样的问题：这是散文吗？散文也能这样写吗？

陌生感还不仅仅在，也主要不在长短上。

“半个胡儿”的形象，早已在读者头脑中定格：“焦躁地刨着前蹄”，“咬紧铁嚼，猛烈地扭动头颈腰身”，无法安分的烈马；“锐目利爪”，“崇信生命本能”，“甚至有些残忍”的凶猛的禽（鹰），几千年温柔敦厚之教未曾使它驯化”；“猛犸象、剑齿虎和食肉恐龙的长阵”一样的“喜马拉雅、冈底斯、喀喇昆仑”（神山），那才是周涛的写照；大气、剑气、豪气、狂气、匪气，那才是周涛的秉性；恢弘阔大，峥嵘峭拔，苍凉浑厚，那才是周涛的风格……

曾几何时，周涛如川剧变脸，改变了自己。

《我醉欲眠》中记录的，是“颇添闲趣”的另一个周涛，另一种生活：他在南方都市的阳台上，“负暄闲坐”，咀嚼往年事、往年人；他在南奥花店徜徉，“赏凤竹幽草，看游鱼闲花”；他在亚龙湾嬉水，享受椰风海韵、碧水蓝天；他在书斋沉潜，将一块极品昆仑老玉，“温润光滑，摩握于指掌之间”……

好个“狂涛”（贾平凹语），果真是胡气褪尽，“浪子回头”了吗？

仿佛意识到了读者必然产生的陌生感，疑惑感，周涛提醒读者注意他在苏东坡身上看到的，“真正优秀的文人，他的创造曾在于他比常人更有活力，更有丰富的人生趣味”；他在北极熊身上证明的“一种生命与任何环境相融的可能。它在极限中求平衡，在极限中达到完美”。

早在 2001 年 12 月，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次演讲中，周涛曾提出一个“文学两极碰撞论”。认为“穿透生活的两极，不管这两极是农村和城市，沿海和边疆，中心和外省，南方和北方，东方和西方等等，这种反差越大，这两极碰撞闪耀出的文学艺术火花就越灿烂。”并坦言自己拒绝“彻底地新疆化”，也拒绝“彻底地北京化”。“我始终在寻找着坐标，不管是思想的坐标，还是文学的坐标”，“我觉得我始终没有丢弃我

们民族文化，也就是中原文化这个根脉。”

在《我醉欲眠》中，周涛再一次声言：“艺术不仅是相通的，也是相连的……连起来才能获得更多营养，才能有一种角度和眼光，才能多一些修养和完善。何必画地为牢把自己封闭在一亩三分地上呢？那是封建社会给农民留下的心态。”《我醉欲眠》让我们看到了上述理论的精彩实践：从塞北到岭南，从鸿篇巨制到轻灵短章，从狂飙突进到冲淡平和，从桀骜不驯到通达内敛，从狷狂放达到常怀敬畏之心、悲悯之心……周涛在生活的两极与文学的两极间自由地游走。

遗憾的是，包括批评家与作家在内的许多读者，对“文学两极碰撞论”还没有作深入地思索。常见的倒是，或批评家命名番号，将一干作家划归其下；或作家们自树旗号，以利作集团式冲锋。当然不能否定这一职业圈内的游戏规则，煌煌一部文学史，几乎也就是各种“主义”与流派此消彼长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。取消了各自的命名权，文学史的书写恐怕就成了问题。只是硬币的另一面常被遮蔽：撇开乱点鸳鸯谱的情况不说，一面旗号或一个流派，通常是以一个或大或小的作家群体的共性为依据的，而艺术活动之异于人类的其他精神活动，却是以区别他者的个性为本质特征的。过度看重旗帜与流派的价值，就鉴赏者而言，常一叶障目不见泰山，以定格化的阅读期待审视不拘一格的作家作品；就创作者而言，一旦侧身某面旗帜之下，常有意无意俯就其既定成规，拘囿了向更广大空间腾挪舒展的手脚。从古及今，不能说这不是一个并非罕见的现象。

《我醉欲眠》让我们再一次领略到，优秀的作家，总是在不断地修正自己，变化自己，补充自己，丰富自己。他不会以一个固定不变的面孔示人，哪怕是这张面孔已为大众认可、熟悉，并广受赞誉而具备了“品牌价值”。“杨朔模式”固然成因复杂，画地为牢，重复自己，也是教训之一。

苏子为宋词豪放派开山，但凡言必铜琶铁板歌大江东去，则歌者

也累，听者也乏；伟人如毛泽东者，掌上千秋史，胸中百万兵，一落笔满纸王者气象，但也不乏柔情似水之作。而惟其如此，方是真性情也、真诗人也。

当然，变与不变，或变中之不变，此间奥妙多多，不可赘述，而时间当为诸多因素之最。“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也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也”，一代诗仙，早就把这个理悟透了。

年齿渐长，人文皆变，一如寒暑易节昼夜更替，是规律使然。而为人与为文的双重改变，其实并不先在地与艺术价值高下构成同比关系。老而弥坚者寡，老而冬烘者众，倒是更为常见的残酷现实。所能倚老卖老者，甚至也不在乎技艺的炉火纯青，根本点还是看你对社会、对人生、对艺术是否有更睿智的思考，更透彻的洞穿，更深切的体悟。以此决定你在这个日益由前喻社会走向后喻社会的时代，能否保留一点在后生晚辈耳边絮叨的本钱。以我观之，周涛胜人之处，正在于此。前所言“文学两极碰撞论”，所言“地域之于文学的影响胜过时代”等等，皆为新人耳目之论。《我醉欲眠》中，仅对“以自然为本”的呼吁，便觉胜“以人为本”一筹；而对“文运”说的提出与阐发，所谓“成不朽之名者，必有大文运，缺一不可”，“特定的人与特定的时代相遇，就是文运”云云，实在是对中外文学史独具慧眼的观照，也是周涛文学江湖闯荡几十年，阅人阅世阅己（自省）的心得，是一句禅家的开悟之言，其“理论含量”多多。以此告诫鄙薄李白贬抑鲁迅的青年明星学人“知天命，识大运”，“有一点自知之明”，“保持一点谦虚敬畏之心”，便自然而然地获得了话语权。

在《我醉欲眠》中，字面的轻松随意，沉淀的分明是人与岁月搏斗的悲壮。有道是英雄老来皆归佛，宿将还乡不言兵是也。那只时间的鼬鼠，是谁也捉不住的。今年二十，明年十八，只是商家广告，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实。可是一代代人，不会因为“捉不住”而不捉，却同样是明白的事实。

不妨说,《我醉欲眠》,就是周涛捉到的一只鼬鼠。

他捉住了它。酸甜苦辣,五味杂陈;离合悲欢,百感交集。而俯仰之间,星移物换,这一切都统统杂糅发酵,化出一坛老酒来,平淡而醇厚,历久而弥香,就像阳光包容了七彩。

也不妨说,《我醉欲眠》,就是周涛酿造的一坛老酒。

别指望从里面读出风花雪月,吊诡奇崛。喜欢这些的朋友,尽可以去读青春读物,时尚文章(不含贬义)。世间有一类文字,是只合于上了些岁数,有了些阅历的人去读,去品的。

(原载《人民日报》2009年7月20日,发表时有删节)

来自大西北的文化抵抗

——论周涛散文的文化精神

入世精神与家国情怀，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。这一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化语境中出现了明显的变异。此时之中国，正步入千年未有之变局，仓促而急剧的社会转型携带着过多的短视与功利，伴随着严重的物质与精神的失衡。这理应成为文学价值彰显与意义照亮的绝好契机，在适度为世俗化的合理性辩护的同时，更高扬文学批判与超越的旗帜，像西方国家许多优秀作家那样，作欲望世界里的精神守望者与终极价值的追寻人。遗憾的是，我们在身边看到的却常常是另一番风景。“举世浑浊，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？众人皆醉，何不饷其糟而啜其醨？”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)神龙一现的江上渔父如此规劝行吟泽畔的三闾大夫，屈原置若罔闻，终于怀沙自沉了。而此言之千年余响，却分明为屈原的徒子徒孙心领神会，欣然采纳……有道是沧海横流，方显出英雄本色，文学界谈论得较多的 抵抗英雄”是“二张”(张承志、张炜)，面对这个充分物化的世界，面对覆盖一切的商品逻辑，面对在滚滚红尘中浮沉委顿的心灵，“二张”大声说不。其一人手持的武器是哲合忍耶，另一人构筑的精神家园是古朴的民间村社……相比“二张”，另一位来自大西北的抵抗英雄周涛却鲜为人所认识，或者说，尽管其诗其文炙手可热，从文化意义上评判周涛的价值，尚未被许多人所认识。在我看来，比之 “二张”，周涛

的文化抵抗至少是同样艰苦卓绝而又有声有色的，并且其切入的方式及呈现的特点，都有迥异于“二张”的特征。

1.“尽善来自朴素，尽美来自自然”：对病态世风的文化救赎

周涛由诗而入散文，其中一以贯之的不变的美学元素自然多多，暂且按下不表。因为我认为捕捉其审美理想的嬗变更有意义，或许这正是理解周涛散文文化意义的锁钥。

兀立荒原／任漠风吹散长鬃／引颈怅望远方天地之交／那永远不可企及的地平线／三五成群／以空旷天地间的鼎足之势／组成一幅相依为命的画卷

这是《野马群》中的诗句，在周涛评论中引用率颇高，几成诗人周涛的一张名片。诗的画面感极强，以东坡赞王维之“诗中有画”誉之，当非溢美之词。我从中强烈感受到诗人对形式美感的钟情与追求，甚至不妨说有几分“唯美”的色彩。

令熟悉的读者始料不及的是，作为散文家的周涛，没有沿着这条轻车熟路继续前行。

凡由诗而入散文者，极易遁入两途，一是顺其道而行之，迷恋炼词秀句（常露雕章琢句之病）；二是反其道而行之，渐趋冲淡平和。而周涛文风之于诗风，变化却是革命性的。

当然，周涛散文颇丰，像摘引诗句那样作一鳞半爪引证是很困难的，还是用周涛的夫子自道整体概括好了：

周涛视自家散文为 “一条河流”，“带着沿岸的泥沙和尘土、草皮、枯枝败叶，以及羊粪蛋、马尿，稀里哗啦就下来了，但它那种生命力、强大的生活原动，充满了野性的力量”[①]。

不难看出，两者的反差是如此强烈。散文家的周涛已经摆脱了对形式美感的依恋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代之以对天地间大美的追求了，正